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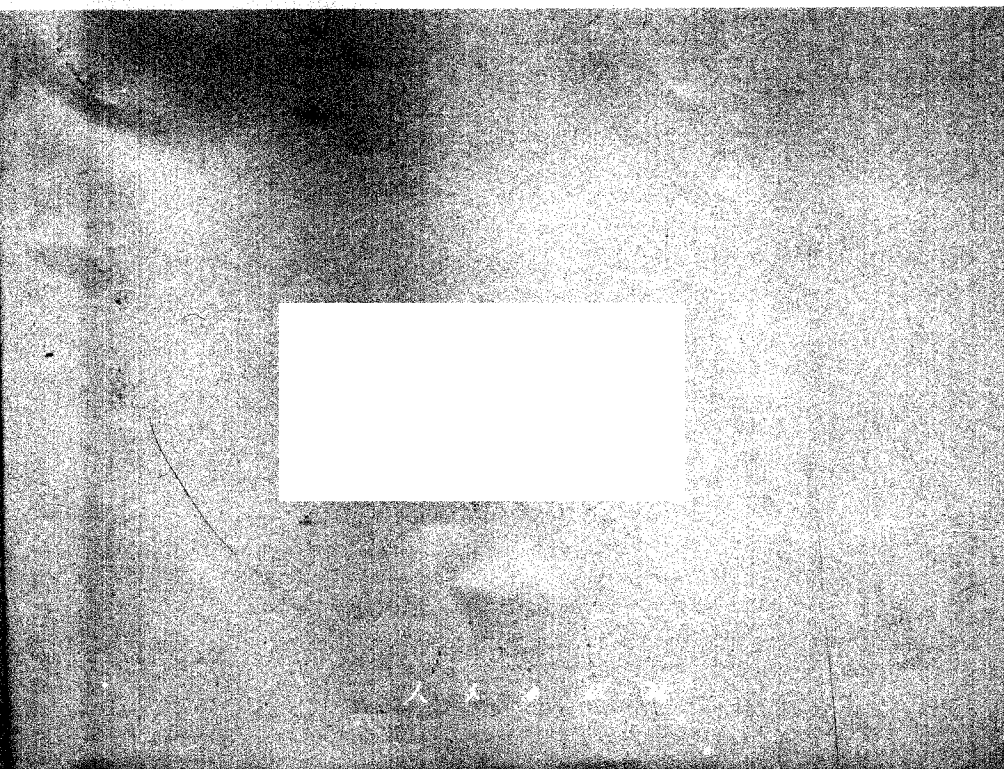
中国反腐败 二十年

陈波 /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反腐败 二十年

陈波 / 著



责任编辑:柯尊全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反腐败二十年/陈波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

ISBN 7-01-003133-9

I. 中…

II. 陈…

III. 廉政建设-概况-中国-1979~1999

IV. 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841 号

中国反腐败二十年

ZHONGGUO FANFUBAI ERSHI NIAN

陈 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84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01-003133-9/D·873 定价:21.20 元

序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指明了方向。十五大报告同时提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和国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遏制消极腐败现象的工作路子。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反腐败是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任务和共同课题。在我国,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党章和各项政策的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体制已经形成。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工作思路和总体工作格局长期坚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上不断创新、发展。最根本的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依靠法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和监督;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结合为工作的出发点;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强调监督机制的形成与效果;长远目标与阶段性成果相结合,扎实推进;牢牢抓住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三项重点,等等。这些沉淀与积累,既是我们多年来反腐败工作得以深入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也是新世纪反腐败工作能够成功地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根本保证与方向。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特色理论。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反腐败理论思想及其实践成果,已载入共和国史册。穿越 20 多年的时光隧道,对它们进行总结、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的职责。

反腐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不同时期,特别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的现状、成因、危害及对策的深入研究与探讨尚需时日,希望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本书出版之际,适逢共和国改革开放 20 年、建国 50 周年大庆、人类共迎新千年。应作者之邀,写上几句话,谨表欣喜之意以作序。

张 宁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

引 言

共和国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是中国人民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巩固人民政权的绚丽画卷，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护国家政权，艰难探索、艰苦卓绝的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更是我们探索、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厉行反腐保廉，跳出“周期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民主革命问题时，曾经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话：“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翻开共和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反腐史，我们不能不提及新中国反腐保廉的起始源头。

穿越五十年的时光隧道，往事悠悠就在眼前。1945 年 7 月，尽管中国抗战全面胜利的爆竹还未炸响，但延安之兴盛与重庆之没落的强烈反差，已经对未来中国之命运作出了清晰的勾画。此时，略带书卷气、充满学者风度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应邀访问延安。面对头发略显凌乱、穿着灰色土布衣服但精神焕发的毛泽东，他在无限感慨中把思虑从时兴中的“中国向何处去”的话题转向了一个似乎有些超前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

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大凡初时，都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慢慢放下了。有的历史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而且无法挽救。一部中国历史，几朝几代，荣辱兴衰，却终究无人跳出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周期率。中共诸君，可否找到了一条新路？”

毛泽东以他那富有魅力的湖南口音，自信而又坚定地回答：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黄炎培笑了，笑得是那樣的开心。这位历经三朝、久涉沧海的老人，笑过之后眼眶竟有些湿润。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始终没有放下来。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站在华北平原的这个小山庄，他的目光越过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喜悦，久久地停留在中国知名文化人、后来成为国家文化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这位伟人以非凡的清醒，向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全体党员发出警告：“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为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的这番话，精辟透彻，掷地有声，及时警告全党：资产阶级的腐蚀，我们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将成为新生人民政权的主要危险。是预言又是面临的现实，更是指明方向。毛泽东把这一实在是让人无法轻松地谈起，而又无法轻松地放下的话题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迅速传达到解放区各级党员、干部耳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面对胜利，亿万人民欢欣鼓舞，衷心感谢共产党。但是，1949年的人民中国，所接受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连年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以国民党残余势力为主体的破坏活动，使得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同时，党和政府依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一些不法资本家错误地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冒险家”的新乐园已经到来。他们不满足于依法正常获取利润，而是力图利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肆无忌惮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活动。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200多万新党员中有些人的思想作风不纯；党内的某些党员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或多或少地滋长着居功自傲的骄傲自满情绪，有的甚至于贪图个人享受，走向腐败的道路，完全失去了革命性。

为了遏制刚刚抬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风气，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展现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一场大规模、暴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已不可避免。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由此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反贪污为

主要内容的反腐败运动,也就是“三反”运动及随后开展的“五反”运动。这一运动中,京城卢沟桥畔、保定市东关大校场先后枪毙国家贸易部畜产贸易处副处长薛昆山,国家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河北省天津地委、专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枪声,在人们的耳边回响了几十年。

“三反”、“五反”在基本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后,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等腐败问题虽有所收敛,但并未根本绝迹。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并于1963年3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即城市新“五反”运动。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反腐败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反腐败成果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出现反复是可以理解的。工作任务是长期的,任务是复杂的。

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现象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根据群众反映基层铺张浪费严重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于1970年2月5日下发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随即,全国开始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这对惩治腐败、保持廉政建设的继续进行,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鉴史明今,回首共和国前30年的反腐败征程,不能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的忧虑与不足。但我们信念不改、初衷未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谱写永葆人民江山颜色不变的巨著宏篇。

目 录

序	张穹(1)
---------	-------

引言	(1)
----------	-----

第一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	-----

走向光明	(1)
------------	-----

春雷再起	(5)
------------	-----

太子公司皮包公司双出局	(10)
-------------------	------

1989 年反腐风暴	(14)
------------------	------

第二章 廉洁自律 制止奢侈浪费	(23)
-----------------------	------

领导干部是重中之重	(23)
-----------------	------

政治纪律是铁的纪律	(27)
-----------------	------

清车工作雷声大雨点猛	(33)
------------------	------

公款吃喝玩乐何时休	(37)
-----------------	------

尽管棘手,清房仍大步前进	(43)
--------------------	------

疏导受礼,强化规范	(47)
-----------------	------

国企领导不能成为反腐死角	(51)
--------------------	------

制止奢侈浪费	(56)
--------------	------

清除耳朵边的腐败	(65)
----------------	------

第三章 痛下猛药 狠纠不正之风	(73)
治理“三乱”	(73)
根治公路痼疾	(77)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82)
斩断伸向国企的黑手	(93)
还学校一片绿洲	(97)
刹住公款出国出境旅游歪风	(104)
“窗口”自查自纠与民主评议	(107)
第四章 精简机构 杜绝用人腐败	(127)
迫在眉睫	(127)
领导机关率先垂范	(130)
干部管理制度改革时机成熟	(135)
第五章 堵住源头 维护司法公正	(141)
教育整顿,整章建制	(141)
1998 年风云	(155)
与实体脱钩,不再经商	(156)
吃“皇粮”,执行收支两条线	(159)
清除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	(168)
第六章 毫不留情 清除渎职失职	(173)
决不允许“学费”白交	(173)
拒绝临阵脱逃	(184)
弄虚作假是大敌	(188)
第七章 动真碰硬 痛击大案要案	(197)
处长局长纷纷落	(197)

落马的还有高官俊彦	(215)
大案要案从来都是重点	(232)
第八章 对腐败和反腐败的沉思	(253)
腐败到底有多严重	(253)
需要甄别的话题	(256)
反腐败的重点	(258)
反腐败的难点	(263)
永不过时的话题:依靠人民	(267)
监督:一篇已破题的文章	(273)
治标又治本:反腐败的根本出路	(278)
面向新世纪的反腐败	(286)
附录 中国反腐败 20 年大事记	(291)
后记	(371)

第一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每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背景;同时又必然给那个时代打下深深浅浅的烙印。历史创造和推出英雄,而英雄对历史的回报是驾驭历史,谱写历史,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

走向光明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正是我们党、国家、民族遭受“文化大革命”这一深重灾难的时期。此间,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党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认识问题上和历史事件上所犯的错误,进行大量罪恶活动,使全国的党、政、军、民组织机构陷入瘫痪状态,国家的民主法制遭到肆意践踏,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横遭批斗、迫害和株连,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以派划线,极大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

当时,远离政坛、权力中心的另一位伟人正时刻关注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他就是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

是金子就会闪光。中国历史进入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均是重病缠身,迫切需要一位有声望、有治国之才的干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离开江南回

到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着手对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进行整顿,特别是遏制和扭转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邓小平连续召开一系列的会议,斥责和整饬“肿、散、骄、奢、惰”等消极腐败现象。他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明确提出,请那些搞歪风邪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领导干部彻底休息,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而要选拔“党性好、团结好、作风好”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担任第一、二把手。邓小平认为的“党性好、团结好、作风好”的同志,是指“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艰苦奋斗或比较艰苦奋斗”,搞五湖四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组织性、纪律性强,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也着手对军队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地方上的各级也部分、逐步调整领导班子。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中,邓小平专门提出了整顿领导班子的问题。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力所能及地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惩治腐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了不少工作。他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领导;强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恢复和完善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倡导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宣传、学习优秀、先进人物;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等非法活动,治理社会秩序等等。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1975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而使刚刚受到批评和遏止的消极腐败现象再度抬头。

然而,惊雷已经炸响,暴风雨过后必定是明媚的阳光。

1976年金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史再一次赋予中华民族实现腾飞的极好机会。然而,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组织上继续搞个人崇拜以及对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不予平反;经济上

盲目冒进,等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等老同志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已记入史册的1978年12月16日至2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全会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判,冲破了“左”倾路线的干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拨乱反正,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基础,也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保证。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多年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历史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为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根本途径。全会在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致要求克服个人崇拜的不正风气,摒弃党内的家长制作风,恢复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尽快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生活,从而建立党的自身监督机制保证执政权力的有效行使。最后,全会还在认真讨论民主与法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并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之下,从而为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奠定了基础。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指明了根本的途径和办法,它标志着党的反腐败

斗争新阶段的开始。

任何政党确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恢复了党的纪律监督机构,成立了由 100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会议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1979 年 1 月 4 日—2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把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民族人民中去的决定。会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县、团以上各级党委中建立纪律委员会;为了切实搞好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的工作,全会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准则》。在全党工作重点实行伟大转变的重要时刻,重新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积极开展党内执法执纪工作的监督,是党中央在组织上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的标志,表现出执政党加强自身整顿与净化的坚定信心。它对于搞好党风,严肃党纪,保证执政党的廉洁奉公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文革”结束后,为了拨乱反正,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决定对“文革”时期制定的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修改后的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在全国统一、正确实施的专门机关。叶剑英同志在 1978 年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将重建检察机关的目的概括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必要性,宪法修改草案决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国家的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对于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

中央拨乱反正,郑重恢复执纪、执法机构,给人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党内、国家生活、工作将更加规范,依法、依规定办事;国家反腐败工作将会是一番新天地。

春雷再起

1977年7、8月间,邓小平第三次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时,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10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农民尚在贫困线上徘徊。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改革开放,魔方般地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世界,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改革一方面使经济充满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各种经济关系更加复杂,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异常活跃。新旧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产生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错位。在经济领域里,新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与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相互撞击、矛盾交错。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一些人对如何劳动致富产生了错觉。

也许是封闭得太久的缘故,当我们打开国门时,首先翻起的浊